

休茨基论欧洲《易经》的翻译与研究

靳铭吉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休茨基是俄国《易经》翻译和研究第一人，其作品堪称俄国乃至世界《易经》研究成果的典范。同时，他对欧洲《易经》的翻译与研究也有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并基于自身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认知对欧洲汉学家有关《易经》的观点给予了较为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些评价的视角和阐述内容是对欧洲《易经》相关研究成果的必要补充，对我们梳理《易经》的海外传播史也极具学术价值。

关键词：休茨基；《易经》；算法说；文献说；起源说；词典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尤·康·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 1897—1938)是俄国著名的语文学家、汉学家、哲学家、翻译学家。他于1937完成了《易经》的翻译与研究，1960年该成果以《中国典籍〈易经〉》为书名问世，后被译为英文，在英美等国出版发行。休茨基是俄国《易经》翻译和研究第一人，其作品堪称俄国乃至世界《易经》研究成果的典范，被公认为20世纪国际汉学领域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休茨基对欧洲《易经》的翻译与研究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一方面为他的《易经》翻译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也借由这一梳理充分表达了他对欧洲《易经》翻译和研究不同阶段的认知与评价。休茨基的有些认知与评价与我国学者，如林金水(1988)、张西平(1998)、杨平(2015)、李伟荣和宗亚丽(2017)相近，有些则体现了他鲜明的个人主观态度，值得我们了解与关注。休茨基将欧洲的《易经》翻译与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休茨基针对前两个阶段所做的论述与评价。

2 休茨基论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第一阶段

休茨基认为18世纪到19世纪50年代的150年是欧洲《易经》翻译和研究的第一阶段。其特点为对《易经》经文的认知不充分，建立了各种离奇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如《易经》是皇帝伏羲发明的一种算法、《易经》是一部历史文献等。休茨基指出，站在20世纪再回看这些理论时，它们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它们之所以被提及，仅仅是因为需要描写欧洲《易经》的研究史。他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该阶段欧洲汉学家《易经》翻译与研究的充分分析论证基础上的。

2.1 《易经》的算法说

1753年豪普特(Johan Thomas Haupt)出版了一部关于《易经》的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中，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被指认为《易经》的研究者。豪普特认

为是莱布尼茨提出了对《易经》的阐释理论。豪普特仔细研究了莱布尼茨的假设，并将其与1745年两位学者提出的两个论断联系起来。一个叫尼特尔的学者认为：“伏羲帝在自己的书中只是提出了算数关系，这种算数关系是二分之一”。（Щуцкий 2017: 25）另一个叫海森堡的学者认为：“伏羲想利用组合方式列出所有可能的推断形式。按照这一新的假设，所谓的《易经》应该是伏羲《逻辑》一书中的一章，该书的其他章节看来是丢失了。”（Щуцкий 2017: 25）据此豪普特写道：“《易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所谓的《易经》就是由伏羲发明的算法的一个原始遗本。”（Щуцкий 2017: 25）

对于莱布尼茨的《易经》研究，休茨基赞同郝爱礼（Erich Hauer）的意见：“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是德国研究《易经》的第一人。他从皇帝伏羲的卦图中找到了算数的二进制，基于此莱布尼茨认为对整本书中的爻和卦可以做出合理的解读。他希望尽快将自己的这个新解释告知中国人，于是他写信给当时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尽管我们知道这位白晋在给莱布尼茨的回信中对这一解释表示满意，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中国学者对这一发现作何反应。”（E. Hauer 1925: 242）很明显，休茨基认为莱布尼茨的研究需要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可，否则只是“一厢情愿的表白”。

针对豪普特的上述观点，休茨基从两个方面予以驳斥。一方面，他认为，“对于了解《易经》来源及其注疏历史的人而言，以上欧洲学者提出的观点显然是矫揉造作的。”（Щуцкий 2017: 25）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欧洲学者所信赖的伏羲只是个传说。另一方面，他为推翻《易经》具有逻辑和数学内涵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论证。

首先我们来看休茨基如何分析《易经》与逻辑学的关系。休茨基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逻辑学的论著。中国系统化的形式逻辑是在佛教（以印度逻辑学著述的译文形式）传入中国后才开始出现的。梁启超试图从墨子的《墨经》和《墨经说》两章中发现有关逻辑的论述，但这种尝试只是重新整合原文，整合后的文本存在逻辑不连贯的部分，这部分需要再次进行填补，这导致人们怀疑原文的真实性。（Щуцкий 2017: 25）休茨基还进一步指出：“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为墨子是逻辑学家，他的学派在有其一众弟子存在的情况下还曾与儒家和道家学派形成争鸣，但以后几代墨家学派则后继无人，而儒家和道家绵延发展几个世纪，且在不同的分支流派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而佛教的逻辑与墨子的逻辑显然不是一回事，构不成继承或接续关系，构不成竞争关系。考虑到这一点，恐怕就没理由坚持说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已经有了逻辑学。”（Щуцкий 2017: 26—27）

其次，我们来看休茨基如何分析《易经》与数学的关系。他指出，“事实上，在《易经》成书的公元前8—7世纪期间，中国是不可能存在数学阐释论支持者所提出的复杂数学概念的。”（Щуцкий 2017: 26—27）那这一理论为什么会让人印象如此深刻呢？休茨基认为，第一，数的理论萌芽以及对各种被加数都相同（即所谓的平方）的最初观察都是以传说的方式与《易经》起源之神话相关联；第二，在发展《系辞传》有关占卜的《易经》注释派中有一支学派研究了数之迷；第三，在64卦卦图中，每一个卦是由在六个层面（即六爻）上排列的实线和虚线组成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由两个成分在六爻上重新组合后呈现的数学排列（即2的6次幂）。（Щуцкий 2017: 27）尽管如此，休茨基认为，作为《易经》的数学阐释论的基础，以上三种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前两个理由只是以传说或者伪书，而非历史文献为基础的。至于第三个理由，他指出，“数学规律同样可以在世界上一些与数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中被发现。虽然与数学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些现象可以用数学方法去研究。所以，即便我们承认在《易经》的卦中存在着由两个成分在六爻重新组合后呈现的数学排列（即2的6次幂）规律，但我们依旧坚决否认《易经》的实质就隐匿在这一规律中或者说这一本质是这部经典中被遗忘的内容。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些理论中的确有数学的智慧，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对《易经》比较表面的认知基础上的。”（Щуцкий 2017: 27）

从以上休茨基对《易经》算法说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易经》有着更为深刻、成熟的认知，这种认知源自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的博学与领悟。

2.2 《易经》的历史文献说

法国汉学家舒马赫（I. P. Schumacher）认为《易经》中包含中国历史，对此法国翻译家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表示赞同。法国学者福克（Alfred Forke）也对此观点做出说明：“11 卦《泰卦》、53 卦《渐》卦、62 卦《小过》卦和 63 卦《既济》中包含公元前 1191 年和公元前 1320 年的某些历史记录。”（A. Forke 1927: 11）

针对此观点，休茨基指出，“提到历史人物的名字或者地理位置并不能证明《易经》是一部历史文献”，（Щуцкий 2017: 27）但他承认“《系辞传》的第二部分呈现的是古代中国完整的文化史。毫无疑问，这一材料可以作为《易经》是一部历史文献的证据。”（Щуцкий 2017: 27）基于此，休茨基认为，舒马赫视《易经》为历史文献的观点不是建立在《易经》上述 4 个卦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基于《系辞传》。也正因为这一点，休茨基不同意舒马赫的观点，因为它是建立在将正文（即“经”）与注释（即“传”，《系辞传》为“传”）不加判别地混淆在一起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是说，在休茨基看来，《系辞传》中虽有文化史记载，但“传”与“经”并不等同，不能用“传”具有的历史文献性替代《易经》的历史文献性。此外，休茨基还认为，舒马赫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默许了传说资料可以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做法。可见，休茨基认为《易经》更像是传说资料，而非历史文献资料。

3 休茨基论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第二阶段

休茨基认为，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为 19 世纪下半叶的 50 年，其主要特点是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多个《易经》的完整译本。同样，休茨基针对与《易经》有关的一些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3.1 麦格基的《易经》起源说

麦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是第一个将《易经》完整地译成英文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但译文质量不佳，理雅各曾坦言：“我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阅读麦格基的译本，但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有助于我的译本。”（I. Legge 1882: 15）休茨基之所以会提到麦格基，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对后来的一些学者产生了影响。

麦格基认为《易经》像所有多神教宗教书籍和《圣经》一样，起源于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分家那个时代，或者至少多神教的《圣经》源自对那个时代的讲述。如摩西所言，所有民族的祖先都被召集在一个地方，然后记录下被破坏的宗教形式，以便在迁移时随身携带。《易经》被人类“伟大的父亲”拯救于大洪水，它让我们了解古巴比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八个神：父亲、儿子和六个孩子。麦格基根据《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即乾卦和坤卦，判断乾是男性的性器官，而坤是女性的性器官，它们结合在一个圆环中或者男性生殖器内，结合在“太一”中，而由“太一”生万物。理雅各对此评论道：“这太无耻了！居然把上帝等同于迦勒底人的巴尔神。”（I. Legge 1882: 16）在麦格基看来，龙是男性的生殖器，同时又是上帝的象征。（McClatchie 1876: 36）很显然，麦格基的《易经》起源论中包含古代中国存在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观点。休茨基认为，圣经与《易经》、巴比伦与中国、神话与宗教的比较史、古代与现代被麦格基野蛮混搭，而麦格基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任何论据，不过是在貌似科学地胡言乱语，休茨基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人对男性生殖器没有任何崇拜”。（Щуцкий 2017: 29）

3.2 拉古贝里的《易经》词典说

法国汉学家拉古贝里（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 de Lacouperie）认为，首先，《易经》是对真实的古代材料的汇编，但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后来遗失了，因此这些材料被当作占卜文

本；其次，《易经》不是源自中国，它是公元前 2282 年由纳洪特（Nakhunte）国王（又被称为 NaiHwangti，即“黄帝”之意——作者注）率领下的巴克族人带到中国来的。在来到中国之前，他们应该已熟悉西亚的楔形文字。在此之前他们还曾与萨尔贡（即中国的神农——作者注）的后裔有过战争。这些巴克族人了解巴比伦的字典，《易经》就是对巴比伦字典的仿写。

休茨基认为，“拉古贝里的这个发现本来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但他却由此出发踏上了一条残酷的撕裂文本的道路。他毫无体系性地删除那些妨碍他的文句。同样的一个词，他有时会删除，有时会因为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保留。易传部分被他完全抛弃，经的部分也没有被完整取用，而是只取了最古老的一层卦”。（Щуцкий 2017: 30）在这番操作之后拉古贝里得出结论：《易经》是一部字典，它由 64 个词条组成，词典中阐述的是类似国家治理的内容。对此休茨基客观地给出评价：我们承认拉古贝里的观察是对的，《易经》是多层次的，不是在每一卦中卦名都会被重复 6 次，在经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诗，诗的韵律经常被插进来的“吉”“凶”“无咎”等占卜词破坏。（Щуцкий 2017: 30）但休茨基不同意《易经》源自巴克族说法，而是赞同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他认为拉古贝里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不可靠的“论据”基础上的，拉古贝里把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术语“百姓”（意思为一百个、很多个或全部种族的农民或人民）解释为“巴克族人”，“百姓”和“巴克”（bak）只是一种意外的谐音，是语义上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个术语。但拉古贝里坚信他的这一说法，于是把《易经》这本书排除在东亚之外，任性地、以削足适履的方式给了这本书一个出处。休茨基明确指出，即便在该理论提出的当时，它也未能经得起批评。正如福克所指出的，为什么需要一部只由 64 个字符组成的字典呢？那些毫无关联的故事又是怎么进入字典中的呢？（A. Forke 1927: 12）这些拉古贝里都没有给出解释。“退一万步讲，你可以假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易经》只是字典的一部分，但如果你注意到，书中的卦数刚好是六爻上两个成分重新排列后得到的数字，即刚好是 64，也就是说，64 卦是一个内部穷尽的整体，拉古贝里的理论就从根本上崩塌了。”（Щуцкий 2017: 31）最后，拉古贝里认为，《易经》中使用的是东亚语言中的一种死语言。休茨基对这一结论更是无法接受，他认为拉古贝里是在将《易经》中的符号做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处理、使它们四分五裂后，来“证明”自己的上述观点的。

尽管拉古贝里的《易经》词典说受到质疑，但依旧得到了个别欧洲汉学家的认可。如理雅各虽然怀疑拉古贝里对《易经》原文的理解，但他曾对词典说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认为如果词典说中有关阿卡德死语言（即楔形文字）的发现能够为中国文字带来一些启示，那就不要去推翻它。再如，在理雅各译文出版 7 年后，比利时汉学家哈雷兹（Charles Joseph de Harlez）再次回归拉古贝里的“词典理论”。他虽否定了《易经》的阿卡德来源说，但对《易经》的词典理论说深信不疑，并基于此构建了自己的翻译技巧。他言道：“原始的《易经》由 64 个部分或 64 章组成，每一章都有一个用卦或汉语符号表达的主旨或者一个词。对这个词会有一个总体的解释和精神层面的判断。针对这些解释和判断会进一步补充其他一些细节性解释、例证、格言，同时会给出使用这个词的场合，有时还会给出一个完整的片段或者一首小诗。”（Ch. de Harlez 1889: 12）在哈雷兹看来，后来的《易经》中增加了大量的格言警句，而这些格言警句中蕴涵的真正的智慧却是极少的。于是如福克指出的，哈雷兹在翻译时有着很强烈的注释倾向，所以他在译文中加入了更多原文中原本没有的内容。在这样的前提和译著支撑下，在词典理论基础，哈雷兹得出结论：《易经》就实质而言是某一位政治家的记事手册，后被另一位政治家变成了一本占卜的书。而休茨基认为，事实上恰好相反，应该是占卜书被后世各注疏派不断加工后被中国和日本政治家所使用。（Щуцкий 2017: 32）休茨基的观点无疑更符合事实。

3.3 重视注疏的霍道生译本

休茨基认为，法国海军军官、安南学专家霍道生（P. L. F. Philasbre）的《易经》两卷本

译本工作量饱满，但缺乏有价值的理论。“译著的前言很短，重复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传统观点。”（Щуцкий 2017: 32）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霍道生是第一个主张对中国的注疏文献给予必要重视的学者。这一点在他的译著中有所体现，“译著中每一个句子都附有程颐、朱熹和其他一系列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名字经常被隐去）注释的译文。显然，霍道生的译著是在《周易折中》这一注疏汇编本的基础上完成的。此书也被其他译者，如理雅各、卫礼贤等广泛采用。”（Щуцкий 2017: 32）休茨基明确表示，“《周易折中》是一本公认的、相当权威的出版物。毫无疑问，重视中国传统资料的想法是值得称道的。”但他认为尽管霍道生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其译文不能算作成功，因为译者的汉学功底欠缺太多。霍道生在对注疏进行转述时太过主观，正如福克所言“从霍道生的译文中我们无法看到一幅正确的图景，因为他所引述的两部注疏与其说是对《易经》的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独立思想的发挥。”（A. Forke 1927: 13）所以，休茨基对霍道生的评价最终定格在“他的译著只有历史意义。但作为译者，他是第一位认识到要尊重中国的学问，而不是在不了解文本意思的前提下凭空去创造理论的欧洲人。”（Щуцкий 2017: 32）从休茨基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翻译与研究《易经》时他主张尊重中国学问、重视中国权威注疏的参考价值。

3.4 权威的理雅各译本

在英语世界，首部权威的《易经》译本由理雅各（James Legge）完成。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易经》的译本很多，但翻译得都很不好，因为像《易经》这种作品，总体来讲是不可译的。我建议参考理雅各的译本。”（H. Maspero 1927: 444）休茨基借用马伯乐的话对理雅各的《易经》译本做出了基本评价。他不认为理雅各的译本是欧洲汉学中的极品，因为译著中尚有一系列缺点，但他承认理雅各的译本是长期辛勤工作的成果，是当时的最佳译本，曾在欧洲产生过很大影响，即便是在他研究《易经》的年代，理雅各的译文仍具有自身的价值。对于理雅各的译本，休茨基重点关注了它的序言和前言，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休茨基对理雅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当理雅各在前言中说到《文言传》¹是《易经》的一个附文时，他的认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前辈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Щуцкий 2017: 33）这是因为理雅各在译著的前言中指出《文言传》的作者不是孔子，而这与传统上认为《文言传》是孔子补写的这一观点截然不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理雅各指出，在《左传》中有一处曾提到根据《易经》占卜一事，这件事的发生比孔子出生早了14年。理雅各因此怀疑孔子不是该传文的作者，同时也否定了孔子是其余附文（即《十翼》其他篇目）的作者。此外，理雅各在其译著前言的第4页中还指出，《周礼》中有一个根据《易经》进行占卜的故事，理雅各因此怀疑《文言传》不是真正的古文献²。休茨基认为理雅各的怀疑是对的，且理雅各将《易经》的经文与传文分开的做法是明智的，应该仔细区分开来³。但他同时指出，上述信息应该是理雅各从《周易折中》中获取的。休茨基还进一步指出，“理雅各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他用20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了解了注疏文献，并借助《周易折中》和刘歆目录中的信息了解了《易经》的存在和它的范围（规模、大小）……他认为欧洲的《易经》学者不断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易经》这部经典以及关于它的注疏文献了解得不够深入，所以在前言中他需要将他的认知与当时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比较。”（Щуцкий 2017: 33—34）。

其次，休茨基指出了理雅各译本中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理雅各对《易经》的阐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在理雅各译著前言的第一章中，当论及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时，理雅各引用了《论语》第7章第16条⁴的语录“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来证明孔子是知道《易经》的。此处理雅各将“五十以学易”理解为“再给我50年时间来研究《易经》”，且认为“孔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70岁了，他对孔子希望增加50岁的愿望表示十分惊讶。”而这与中国各种《论语》注疏的

解读⁵完全不同，很显然理雅各的理解是有误的。

第二，理雅各为了证明孔子手中有过并且读过《易经》这本书，援引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晚年喜读《周易》，常常翻阅，爱不释手，韦编三绝的典故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同时摘录司马迁引用的孔子语录：“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用以说明孔子废寝忘食地研究《易经》与《论语》中所说的相互矛盾，因为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很重视研读《诗经》和《礼记》，但在这两本书中对《易经》的研究只字未提。理雅各不怀疑孔子对《易经》的熟悉，但认为孔子早年对《易经》这本书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当时他和他的学生只研读《诗经》和《礼记》，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对《易经》给予正确的评价。对此休茨基评价道：“在理雅各那个时代，他对这件事的认知描述算是最好的了……但理雅各还无法解决孔子手中的《易经》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易经》这个问题。”

第三，休茨基认为理雅各在《易经》经文创作者这一问题上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休茨基指出，在第二章讲到将原始的三爻重置变成六爻重卦时，理雅各先是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是传说中的伏羲重置三爻卦形成六爻卦，但在后文理雅各却说：“我注意到，从远古时代中国就已经使用占卜，但我不想说早在 5200 年前的伏羲时代就开始有占卜，因为我无法抑制自己对伏羲这个人物真实性的怀疑。”由此休茨基认定理雅各的表述前后矛盾。我们认为，休茨基在此处可能误读了理雅各的原文。理雅各的原文表述为“我不敢冒昧地反驳朱熹关于重卦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思考的是，这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卦的名字是从文王那里来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事实上理雅各可能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不敢冒昧反驳朱熹认为伏羲重置六爻的观点，但他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态度，即认为《易经》的卦名来自文王，而伏羲只是传说中人物，他是否真实存在，至少在理雅各那里是不确定的。

最后，休茨基认为，理雅各把《易经》排在中国文学第三古老的位置是不对的，因为在《书经》和《诗经》中有的文章比《易经》古老很多，而且除了《周易》，还有《连山》和《归藏》。但必须肯定理雅各的另一个观点，即“如果考虑到此书的保存完好性不亚于以色列、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古文献，那么此书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到《易经》的古老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不包括较晚的部分，即在中国被称为《十翼》的部分（理雅各称为附文的部分）。

总之，休茨基认为，理雅各的译作鲜有错误，因为作者传递的是中国的理论，且没有像拉古贝里那样追求爆炸性的发现。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休茨基在考察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前两个阶段时重点关注了较有代表性的《易经》的算法说、历史文献说、起源说和词典说，并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为这些观点对《易经》的研究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历史意义。而霍道生和理雅各的译著和部分观点对于欧洲的《易经》研究具有促进和推动意义，尤其是理雅各的译著，在充分尊重中文各类注疏的前提下，积极表达自己对《易经》作者、经文与传文是否需要分开以及文献古老性的观点。休茨基对以上两个阶段的总结是相对客观的，这种客观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哲学相对专精的把握；同时，他的总结也是较为主观的，这种主观是在排除各种论说可能性之后对相关问题的再认识，有时同样缺少充足的证据，如他对《易经》作者的认识、对经文和传文性质的认识。但总体上，我们认为，休茨基对欧洲早期《易经》的翻译与研究是有着准确且深刻的认知的，这也为他自身从事《易经》翻译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附注

1 《文言传》又名《文言》，系解《易》之作最早的《易传》（即《十翼》，具体为《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中的 1 篇，是专门对乾、坤两卦义理所作解释的作品，解释乾卦的称《乾文言》，解释坤卦的称《坤文言》。《文言传》旧说为孔子辅《易》之作，近代学者多认为它们非一人一时之作，杂出于战国、秦汉间人手。

2 我们认为，理雅各提出的两条证据中似乎没有区分《左传》和《周礼》中提到的《易经》究竟是包括“经”和“传”在内的《易经》，还是只有“经”部分的《易经》。如果是前者，那的确是矛盾的，孔子的时代要晚于《左传》和《周礼》的时代，如果《文言传》或者《十翼》为孔子所做，《文言传》部分不可能出现在《左传》和《周礼》中。

3 理雅各认为，按照传统说法，主要经文部分是文王和周公所写。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即经文中较少的部分是周文王所写，正如司马迁所说，成文于公元前 1143 或 1142 年之前，而第二部分，即较大的部分是由逝世于公元前 1105 年的周公完成（第 6 页）。

4 此处休茨基有误，应该是《论语》第 17 条。

5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指出，这章又有许多不同解释，主要是为什么是“五十”呢？朱熹说，“五十”是“卒”字之误。有人说是“吾”字之误。钱穆和另一些人说“易”是“亦”，是指“五十岁继续学习，也就可以没有大错误了”。（李泽厚 2010：162）

参考文献

- [1]Конфуций.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M]. Пер., коммент. Проф Ю. К. Щуцкой; предисл. Б. Виногород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 2017.
- [2]Forke A. Geschichte der alt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M]. Hamburg: Kommissionsverlag Co., 1927.
- [3]Harlez Ch. de. Le Yih-king : texte primitif r éabli, traduit et comment é[M]. Bruxelles: Journal Asiatique,1889.
- [4]Hauer E.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t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M]. Berlin: Leipzig, 1925.
- [5]Legge I. The Yi K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882.
- [6]Maspero H. La Chine antique[M]. Paris: Forgotten, 1927.
- [7]Wilhelm R.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tungen[M]. München: Eugene Dicderichs. 1989.
- [8]李伟荣，宗亚丽.《易经》欧洲早期传播史述[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7(3).
- [9]李泽厚. 论语今读[M]. 上海：三联书店，2010.
- [10]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J]. 文史，1988(29).
- [11]杨 平.《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6)
- [12]张西平.《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J]. 中华文化研究，1998 年冬之卷.

Hutsky on European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Book of Changes*

Jin Ming-ji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Hutsky is the first person to translate and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in Russia, and his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Russia and the world. He ha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European *Book of*

Changes, and based on his own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philosophy, he gave a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views of European Sinologist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perspectives and explanatory content of these evaluations are necessary supplements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uropean *Book of Changes*, and are very valuable for combing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Key words: Hutsky; *Book of Changes*; algorithm theory; literature theory; origin theory; dictionary theory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1 年黑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儒学研究”(编号: YLSCX2021-019HLJU) 及 2021 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翻译+汉学’模式下中国儒学典籍俄译研究——以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论语》俄译本为例”(项目编号: WY2021074-C)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靳铭吉(1974—), 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8-08

[责任编辑: 信 娜]